

张 说
——初唐渐盛文学转型关键人物论

周 睿 著

中 华 书 局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编委会

主 编：刘明华

编委会：

方有国	王本朝	代 迅
刘明华	肖伟胜	余 纪
何宗美	胥洪泉	曹 建

总 序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在中华书局出版,对于文学院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同仁们,都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丛书题名“博雅”,缘于我院前辈吴宓先生早年倡导的大学应该培育“博雅之士”的教育理念,学院的院训亦为“仁爱·博雅”。因此,博雅论丛的出版便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是为纪念吴宓先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八十周年;二为整体展示学院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成果,推进学科建设更上层楼。

近年来,各大学对科研工作高度重视,一个重要动力是“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在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目标。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的西南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有六十年的积累,一大批著名学者在此传道授业解惑,学术成就斐然,为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的传统,形成了良好的风气。由于各种原因,学科平台建构曾一度滞后,自然也影响了更好更快的发展。好在根基在,风气有,大家有沉稳的心态,在守望学术的时候,也调整思路,积极争取各级各类研究项目,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与联系,确保有良好的基础和环境能安心从事科研工作。学校和学院也尽可能提供有利于科研的条件,使中青年学者能够集中精力,以便完成高水平成果。更有一批优秀的青年才俊,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理论素养良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拓展,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特色,向学术界交出比较满意的成果,从而整体推进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本次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的申报成功,就是学术界的前辈、同行和朋友们对这个优良传统的肯定,对近年努力工作的老中青学人辛勤劳动的肯定,对这个学科群体智慧和力量的肯定。丛书的首批作者都是近年毕业的博士,其成果多是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项目及博士基金的结题成果。在专业鉴定上,已得到同行专家的肯定。这批成果陆续出版,必将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沟通,并促进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几年前,当中华书局出版我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论丛时,我曾在序

中表达过自己对学术工作的认识,那也是自己的信念与坚守。现在看来,还未过时,我援引这段文字作为这篇短序的结束,与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及读者共勉:

一个单位,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有一个持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既不能中断,也无法飞跃。学术不能搞大跃进,学术工作无法春耕秋收。学术活动是一代又一代有志于学的学人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个人的学术生命在学科的发展中得到延续。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学术之花才能结出富有学术含量的硕果。学术工作是艰难的,学术研究也是快乐的。——正是上面这些共识,使得这一个群体薪火传承,多年坚守在古代文学的领地,耕耘着辛勤,收获着快乐。

感谢中华书局对“西南大学博雅论丛”出版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回报社会 and 学术的一个最好形式。

2010年12月冬至夜
刘明华于西南大学文学院

前 言

在初盛唐转变之交，一位“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身兼朝廷重臣和文坛翘楚双重身份的张说。本书拟在坚实的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对张说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打算以对张说的研究为切入点，对初唐文学向盛唐文学的过渡作具体的深层次的探讨。

张说历任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封燕国公，位高权重、政绩突出。在政治方面，他重道尊儒，大兴礼乐，辅佐玄宗推行“王道”，《新唐书》赞其“又图封禅，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他“博采文士、旌求硕学”，力倡儒学，以文选士，加上与玄宗的密切关系和其崇高的政治地位，其对开元时期文化政策的制定，实有深远的影响，韦述称道“上之好文，自说始也”。在军事方面，他三次总戎临边，抚慰九姓部落、平定边镇反叛，还提出裁减边兵和改革兵制两项重要建议，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在文化建设方面，张说对集贤殿体制的发展与完善贡献尤大，并监修国史，主持大型图书的编撰，如《唐六典》、《大唐开元礼》等。张说“喜延纳后进，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与文士交游甚广，人物品评多以文才为标准，亲自提携了盛唐高潮的不少文士，被其提拔或投其门下的，包括贺知章、张九龄、孙逖、王翰、徐坚、李泌、房琯等，他们诗文酬唱、切磋技艺，而这些人后来又提携后进，如贺知章之于李白，张九龄之于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孙逖之于李颀、李华、萧颖士，这些人是后来构成清健壮阔的“盛唐气象”的生力军。

张说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重要的文学家。他标举“奇情新拔”、“天然壮丽”的审美理想，在美学观和文艺观上体现了盛唐气象的通达和壮阔。他的诗歌创作各体皆备，既长于五言，复多古体、歌行。其中，羁旅行役、徜徉山水之诗，感情率真质朴，描写细致生动，初显兴盛气象。贬谪及高官期间，题材多样、内容充实、风格清健，风骨与文采并重，呈现初盛唐过渡的特点，体现了魏晋与齐梁诗风结合的倾向。他更大的功绩体现

在散文与骈文的创作上,诚如《旧唐书》本传所说,其“为文俊丽、用思精密,……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张说散文境界阔大、格调雄浑,“笔力沉雄,直追东汉”,运散体之气于骈体之中,使其骈文与散文的创作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为革新齐梁积弊、开创宏丽文风进行了大胆探索,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云:“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将张说的文章功用置于“唐文三变”的历史背景中,对其文学功绩作了高度的肯定。

由此可见,张说是初唐向盛唐过渡的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亦是初盛唐文艺风潮的转换人物。但是对张说的研究,目前还很不足,不仅缺少总体性的研究专著,就连其诗文的点校本甚至选注本都没有一部,这是十分遗憾的。张说作品《全唐诗》存诗五卷、三百五十余首,《全唐文》存文十三卷、二百五十余篇,是初唐以来存世作品最为丰富者,但他的作品,无论诗或文,都尚未得到具体深入的研究,他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也还未得到客观科学的评论。当然,张说存世作品之多,是与其位极人臣的政治地位分不开的,其诗文的艺术价值,若与盛唐作家比也是不足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将如此厚重的文学遗产视而不见。研究这样一位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有杰出成就的人物,确认其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意义,是很有必要的。

本书拟整体研究张说的生平思想和文学成就。首先,弄清张说生平、仕履的若干问题,以明了张说的仕宦生涯对“开元之治”和“盛唐气象”形成的确切贡献。其次,通过对其交游的考证,突破之前的研究大多限定在“燕许”、“二张”的并提,从诗人交游与诗人群的角度来把握,全面理解初唐渐盛的时代风尚和文化背景。再次,通过对其思想深入研究,重构张说在中国传统思想史和文艺理论史上的地位。最后,以嘉业堂丛书本重刊清光绪乙巳仁和朱氏结一庐丛书椒花吟舫影钞本《张说之文集》二十五卷,补遗五卷(文物出版社,1982年)、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丁酉伍氏龙池草堂家藏校刊本《张说之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为底本,参校《全唐诗》、《全唐文》、《全唐五代小说》所收录张说作品,对其文学创作实绩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客观科学地评价张说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是非常必要的。总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张说研究引向深入,是本书的努力方向。

本书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澄清过去在张说生平、家世、仕宦、交游、思

想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如张说的籍贯问题、吏治与文治之争中张说的处境变化、以张说为中心的三个文士集团、儒释道思想的主导问题等等,还历史人物以真实面貌;另一方面,不仅将对张说的文学成就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如应制诗的价值估量、文章创作运散于骈等等,而且还将对初唐文学向盛唐文学过渡的某些深层原因进行探讨。全面而细致地勾勒张说其人其文的总体风貌,从其文艺理论、美学思想、诗歌创作、散文韵文创作、传奇创作、文化政策的制定及其文化活动、文士提携、对盛唐文坛的影响等诸多方面予以界定,评价其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应该说是并不无意义的。

回顾近百年对张说的研究史^①,陈子展的《张说一千二百年忌》当是开山之论,张说第一次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把张说的诗置于初盛唐之间,认为他不仅承继初唐风格,而且作品整篇匀称,无句可摘,使人精神有所寄托,代表盛唐新调(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嗣响寥寥,张说不公正地淡出文学史家的视线之外,直到80年代,张说才逐渐回归到文学研究的视界。

陈祖言撰著的《张说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年)是迄今为止研究张说生平、仕历唯一的一部专书。该书对张说的籍贯、生平、交往以及作品系年都有涉及,但限于年谱的性质,只能点到即止,未能展开,颇为遗憾,对于某些诗文的系年,还值得进一步的商榷。版本方面,仅有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2年)对《张说之集》的版本进行了介绍。

对张说生平与仕历考证,除了《张说年谱》外,傅璇琮通过对《唐才子传》(卷一,中华书局,2002年)的校笺,梳理了张说的生平、仕途,时有新见。海外汉学界中,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张说の伝記と文学》(《吉川幸次郎全集》卷一一,日本筑摩书房,1968年)、美国学者Stephen Owen宇文所安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年)也对张说的生平及文学有所考证。对张说的政治与文化意义的评价,学界也作出了一些努力,如,杜晓勤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文史哲》,1997年第4期)等。儒家思想是张说思想的主导,

^①拙文《百年张说研究回顾与展望》,载《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第52—55页;《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9》全文转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同时他与佛教禅学因缘也很深,在思想方面作出研究的仅见葛晓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张海沙《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等,研究成果不甚突出,对其“三教调和”思想重视不足,结论单一。张说的文艺思想对于初唐渐盛文风的转变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方面的努力大致有杨洁琛的《“完美”的追求:张说文学思想论略》(《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等研究论文。

在诗歌研究上,除了上文提及的闻一多、宇文所安的研究成果外,80年代以来的研究开始渐渐涉及风格、境界、气象、韵味、体裁等方面,相关论文有许总的《论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辽宁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等。对张说的山水诗研究的关注相对较多,值得注意的是葛晓音以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为中心,对张说山水诗的价值认识很有突破性。《全唐文》收张说文十三卷,数量不可谓不多,但对张说骈文、散文及碑志铭文方面的研究,仍显得非常薄弱。一方面是散文研究理论的单调不足,一方面也在于对张说文价值认识的偏见。值得一提的是王太阁,他用力较勤,研究论文包括《张说的审美情趣及其散文的审美特征》(《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论张说散文创作的“新变”》(《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张说的碑志文久负盛名,但成果寥寥。传奇研究是张说研究中涉足较少的领域。最早将张说和传奇联系在一起的是王运熙,他的《“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光明日报》,1958年3月2日)一文,提出张说可能是《虬髯客传》的作者,认为他可能填补盛唐无传奇的空白;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认为张说打破骈体、恢复古文,是唐代小说史上第一个大力进行传奇创作、最有成就的作家。除此以外,则几乎无人提及,研究潜力尚待挖掘。

张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大多数的文学史对张说轻描淡写,仅有个别文学史为其单列专章,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聂石樵的《唐代文学史》(北京师大出版社,2002年)、乔象钟的《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等;但限于书的性质和篇幅,这些文学史在论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未惬人意。近二十五年来,张说的文学史功绩逐渐被重新认识,如葛晓音在《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一文中,论及初盛唐诗歌革新的过程,认为张说是介于四杰、陈子昂和盛唐诗人之间的过渡人物,为盛唐文学提出“奇情新拔”、“天然壮丽”的风格和“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的旨趣;但遗憾的是,这些论文并非将张

说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从而难以在张说本身的研究上深入和展开。

总的来说,新时期以来,张说研究已经逐渐走入主流文学研究的畛域,研究成果从无到有,发展趋势很是可喜。但是,对张说的研究尚存在诸多的学术空白。迄今为止,研究张说生平、仕历的专书仅见陈祖言先生的《张说年谱》,该书付梓已在近三十年前,之后再无嗣响。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文学研究方法的丰富、文献资料的新发掘和新整理,张说的生平、仕履、文艺、文献版本等诸多问题应该还可以得到进一步深化。对张说文学的专门研究,则久无学术专著面世,亦没有点校本、注释本的出现。对其诗的研究,学界往往笼统地认为其作多是应制诗,充满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基调,往往与初唐的上官体、颂体诗相提并论,评价似欠客观,其山水诗前人多以“人谓得江山之助”草草视之,对其它领域的诗作则未加深究,而诸如其赠答诗、咏史诗、感怀诗等题材,都没能引起重视,对张说诗歌艺术的研究也是亟待填补的空白。对其文的研究缺少整体把握,往往未能深入,少有研究者通过作品的细读来把握张说的创作心态,多凭一两篇作品的阅读印象遽下结论,往往采用简单的印象式的批评术语,缺乏对其散文与韵文创作真正深入的剖析。目前所取得的成绩还远不足与张说的创作实绩和文学史地位相匹配,学界期待对张说更为整体、全面的研究。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张说生平研究	1
第一节 张说的时代和政治文化背景	1
第二节 张说籍贯、世系考辨	4
第三节 张说的文治武功述略	17
第二章 张说交游研究	43
第一节 张说与初盛唐君王关系	43
第二节 张说与武后、中宗、睿宗时期文士的交往	51
第三节 张说与玄宗时期文士的交往(上)	64
第四节 张说与玄宗时期文士的交往(下)	75
第五节 与张说相关的文士集团	89
第三章 张说思想研究	96
第一节 儒家思想	96
第二节 佛家思想	102
第三节 道家思想	109
第四节 文艺思想	114
第四章 张说诗歌研究	125
第一节 概论	125
第二节 应制诗研究	129
第三节 山水诗研究	137
第四节 送别诗研究	150

第五节 其他题材诗研究	155
第六节 诗歌艺术研究	163
第七节 对唐代诗作的影响	173
 第五章 张说韵文、散文与传奇研究	181
第一节 文章创作整体评说	181
第二节 韵文、散文分体研究(上)	188
第三节 韵文、散文分体研究(下)	210
第四节 传奇研究	221
 结 语	229
 附论 张说诗文集结集与版本流传、递藏	233
 参考文献	237
 后 记	245

第一章 张说生平研究

第一节 张说的时代和政治文化背景

煌煌唐音,从公元7世纪初陇西李氏家族雄霸天下起,绵延近三百年。李唐从杨隋手中夺过政权之后,经过太宗的贞观之治,国力得到极大增强,再经过几场宫闱剧变之后,玄宗李隆基即位,中国进入最为昂扬激荡的盛唐时代。

一个过渡时期,往往呈现出承前启后的诸多特征。初盛唐之交,即张说所处时代,正是初唐渐盛的过渡。在政治上,经过武周代唐、韦党把政、太平之乱几场动荡的宫闱争斗后,李唐王朝在几十年的篡位、权力衰落和政治腐败的苦难中缓过神来,在玄宗的手中重新达到新的高峰,迎来开元盛世的安定繁荣,尽管玄宗在后期逐渐走向野心与狂妄。在经济上,府兵制在某些政治危机下仍发挥了一定作用,农民不仅远离外来入侵,而且赋税负担也比较轻,封建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出现“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杜甫《忆昔》)的景象。在人事上,姚崇、宋璟、苏頌、张嘉贞、张说、源乾曜、张九龄等贤士先后为相,保证了政治清明的延续性;而这些具有相当地位的宰相几乎无不经过科举,进士考试的威望愈发拔高,对于寒门士子的破格晋升与贵族士族的地位巩固,具有双重的意义。在军事上,吐蕃、突厥、契丹、奚等虽在四境上屡有侵扰,但入侵均得到制止,和约间有签署,总体来说还是以和平为主,没有大规模的野心勃勃、劳民伤财的武力对外扩边行动,出现“朝有著定,下无覬觐,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①的清平之状。在宗教上,武后崇佛,睿、玄宗重道,儒家、道家、释家在各自的层面和空间上相互渗透、和谐发展,民族大融合继续稳步进行。在学术上,《五经正义》一

^① 柳芳《食货论》,董诰《全唐文》,卷372,中华书局,1982年,第3777页。

经学的繁琐纷纭,唐初八史的编订填补正史空白,大型类书、地图、方志、史评的编纂,在学术史上均有一定地位。在艺术上,在西凉、龟兹、天竺、高丽、扶南、中亚及国内各民族音乐、舞蹈文化长期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崭新风格的唐代音乐、舞蹈艺术;而书法、绘画、建筑、雕塑、石窟等艺术形式的全面辉煌,也极大丰富了初唐渐盛过渡时期的文化类型。在文学上,唐诗,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璀璨耀目的奇葩,当之无愧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诗发展到唐代而盛极一时,唐诗高峰的到来,除了政治开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等外部因素外,还包括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时代创作主体的心态品格与艺术素养等因素。另外,唐文在初唐渐盛呈现了新的变化,唐传奇在此时也得到了发展与完善。

对于初盛唐之交的时代政治文化状况,前人多有研究阐述,兹不赘言,本书着重从学术、文学的角度来简单阐释初盛唐之交既有别于初唐,也不同于盛唐的文化特征。

初盛唐之交,知识分子得到极大的尊重。一方面,不少士人从父辈那里承继家学渊源和官职地位,另一方面,一些寒士则经过自身努力,通过科举考试中第出任官职。开元诸位列宰辅的贤相,无不曾黄榜标名,在制度上稳定了获取官职必须通过科举一途的规则,光大了进士考试的威望。知识分子对政治有异常敏锐的洞察力,是社会精神文化的掌握者、社会弊端的批判者。封建统治者要控制社会意识形态,往往通过控制知识分子予以实现,如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德行,尚仁义,实行文化专制;如清代大兴文字狱,文人在训诂考据中噤若寒蝉。而唐代前期统治者敢于在思想文化方面解放禁锢,政治文化环境相对宽松,帝王能广纳言听,匡过补失;再加上安定富庶的社会环境和丰厚绵长的文学传统,构成浓郁的文化人文氛围,促使广大文人积聚深厚的艺术修养,培育出高健的审美情趣。积极的功业追求和通达的处世准则结合,既表现出强烈的功业理想,又着重于独立的人格建构。

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文人之仕途较前顺利无碍。初唐时期激烈的宫闱争斗已经基本偃旗息鼓,而盛中唐时期的宦官、藩镇忧患尚未形成,文人承继宫廷诗人的文风,也尽量避开政治的直接矛盾,忧不深,愤不广,缺乏反映社会矛盾的背景和冲动,多作应制应教、不痛不痒的酬唱之作,埋没了其文学才能。这是必须言明的缺陷,只有当仕途坎坷的时候,文人接触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深入思考一些社会问题,他们内心的不平之气才能激荡出优秀的作品。

这里还须交代两种相辅相成的文化类型：京城文化与外迁文化。所谓京城文化，是伴随着封建文化与科举制度的成熟而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有抱负的文人齐聚京城，通过以诗为媒的社交方式，以诗人群体的社会化交往方式为契机，呈现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并向四方辐射的开放式的结构。而外迁文化，则是昔日的朝中重臣被贬出京之后，形成的迥异于京城文化的异质文化类型：通过酬答唱和的社交方式，形成松散的诗人群体，构建出以贬谪地为中心的文化磁场，不断吸纳周遭文人向其靠拢聚集，从而形成领衔式的组团板块文化类型。开元前期正是京城文化与外迁文化不断激烈碰撞与融合，形成初唐渐盛文学转型的关键时期。

对于初盛唐文坛风气转化的原因，学界已经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如赵昌平认为这种局面的产生，一是由于时代风气的转变与诗史本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二是由于诗坛缺少领袖气质的大家^①；杜晓勤则以“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观点为据，认为姚崇、宋璟等吏治派的为政，打压文学之士，抑制开元初期诗坛的发展^②。曾智安认为，玄宗是诗坛断裂的关键因素，执政之初，玄宗追求极为直接的政治功利，不喜欢诗歌创作和文人做派，并借助儒家正统观念对之加以制约，从而形成极大的由最高权力支持的阻碍力量，对诗坛形成现实、意识两个层面的抑制^③。这些论点都深刻剖析了初唐向盛唐的过渡特征，阐述了当时的政治、学术、文学、艺术状况，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张说所处时代的风尚和趋向不无裨益。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张说身为盛唐贤相，在李唐王朝成就了自己的功业名利。张说“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④，使他的创作实践逐渐摆脱纯粹的文学侍从的性质，而表现出参与最高权力圈中重大决策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即使一些应制侍从之作，也逐渐表现出一些独特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并为所处的时代标举一种弘远阔大的审美境界。清人黄佐在唐诗选本《唐音类选序》中大力称赞道：“盛唐之诗，玄宗为主，而张说苏颋世称‘燕许’者鸣于馆阁，李白、杜甫名为‘大家’者鸣于朝野，王、

① 赵昌平《开元十五年前后》，《赵昌平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4页。

② 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283—289页。

③ 曾智安《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曲折过程》，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第57—65页。

④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百官志二》，卷47，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0页。

孟、高、岑名亦次之。”^①肯定了张说的馆阁之作是为盛唐之音。研究张说这样一位由初唐文学向盛唐文学过渡的风向标式的人物,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节 张说籍贯、世系考辨

一、张说籍贯考辨:范阳说、洛阳说、河东说

张说,字道济,或字说之^②,初盛唐之交著名宰辅、贤相、文伯。“政令必俟其增损,图书又藉其刊削。”^③张说出身望族,“鹰扬虎视,英伟磊落。越在诸生之中,已有绝云霓之望矣”^④。关于其籍贯,《旧唐书·张说传》说:“其先范阳人,代居河东,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阳。”历来有范阳说、河东说、洛阳说^⑤。

范阳说

范阳,唐幽州范阳郡,本涿郡,天宝元年(742年)改置,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又为方镇名,本为幽州节度使,天宝元年亦改为范阳。张说多自称范阳人氏,如《吊陈司马书》自云“孤子范阳张说”;《与凤阁舍人书》称“范阳张说谨上”^⑥。

从世系来看,张说先祖似乎来自范阳。张说为其父张鷟所作碑志《唐赠丹州刺史先府君碑》称“府君讳鷟,字成鷟,范阳方城人也”,然后遂述其谱系演变。这是张说自述世系族谱的重要依据:

张祖曰挥,帝轩之胤。肇勋弦木,锡姓上矣,《诗》有卿士孝友,史有《留侯世家》。八叶至东汉司空皓,公子字,北平太守,始居范阳;四叶至西晋司空华,公子懿,散骑常侍,乃侨江左。昆孙太常,复归河洛,故河东有司空嵒,洛阳有散骑里。后司空至府君,十二代不失仁义矣。王父讳弋,周通道馆学士;考讳恪,无禄早世。府君莼生遗育,四代单绪,家世尚儒,不及伯鱼之训;外祖为理,遂读皋陶之书。以明

① 黄佐《泰泉集》,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张说传》,卷125,第4404页。

③ 玄宗《赐源乾曜张说考中上词》,《全唐文》,卷41,第450页。

④ 张九龄《故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熊飞《张九龄集校注》,卷18,中华书局,2008年,第952页。

⑤ 陈祖言《张说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4页;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载《光明日报》,1985年8月13日。

⑥ 张说《与凤阁舍人书》,《全唐文》,卷224,第2264页。

法历饶阳、长子二尉、介休主簿、洪洞丞。^①

为其父所作墓志,即《府君墓志》,云:

府君讳鹭,字成鹭,姓张氏,其先晋人也。晋分,家世相韩;韩灭,留侯为汉谋主。至字,为范阳太守,因居其郡;及华,博物亚圣,为晋司空。府君司空十二代孙也。曾祖讳俊,河东从事;大父讳弋,字嵩之,通道馆学士;考讳恪,未仕即世。^②

为其祖张恪所作墓志,即《唐处士张府君墓志》云:

府君讳恪,其先晋人。晋有张老,韩有开地,汉有留侯。侯八代孙皓为司空,司空子宇为北平太守,遭汉乱离,家于范阳。至元孙华,复为晋司空。遇难子孙南渡,其处者或寓于蒲坂,周齐间有归者,因从焉。君晋司空十一代孙也。曾祖征君讳子犯,祖河东郡从事讳俊,父通道馆学士讳弋;德音遗范,详诸家牒。^③

为其曾祖张弋所作墓志,即《周故通道馆学士张府君墓志》云:

君讳弋,字嵩之,范阳方城人也。其先张仲,以孝友佐周。子孙丑、周,仕晋相韩,至留侯报韩仇秦,兴刘灭项,为汉世家。九代及于汉乱,居燕四叶,为晋司空,混一天下。司空生祎,避胡过江,六世至太常,而复寓于河东之族人。君即太常卿隆之曾孙,征君子犯之孙,河东从事俊之子。^④

从自述的谱系来看,张说先祖开始在范阳居住,似可追溯到东汉顺帝时期(125—144)司空张皓之子张宇任北平太守之时。《新唐书·宰相世

①张说《唐赠丹州刺史先府君碑》,《张说之文集》,卷20,清光绪乙巳仁和朱氏结一庐丛书椒花吟舫影钞本(二十五卷,补遗五卷),文物出版社,1982年(下称“结一庐本”);《张说之文集》,卷20,明嘉靖丁酉伍氏龙池草堂家藏校刊本,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下称“龙池草堂本”),第130页;《全唐文》,卷228,第2301页。

②张说《府君墓志》,结一庐本卷20;龙池草堂本卷20,第131页;《全唐文》,卷232,第2345页。

③张说《唐处士张府君墓志》,结一庐本卷20;龙池草堂本卷20,第134—135页;《全唐文》,卷231,第2338页。

④张说《周故通道馆学士张府君墓志》,结一庐本卷20;龙池草堂本卷20,第134页;《全唐文》,卷231,第2338页。

系表》云说乃汉留侯张良后裔，历叙其世系，即是依据张说的《唐赠丹州刺史先府君神道碑》、《府君墓志》、《唐处士张府君墓志》、《周故通道馆学士张府君墓志》四篇碑志而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六亦称“唐宰相范阳张说之”。张说自称范阳人，时人亦沿用其说。如卢藏用《太子少傅苏瓌神道碑》，称“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学士兼修国史皇太子侍读范阳张说”^①；苏颋《赠礼部尚书褚公神道碑》亦称“范阳张说”^②。张说奖掖之后学亦认同张说的身世。如张九龄《故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称“公讳说，字说，范阳方城人”^③；孙逖《唐故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燕国文贞张公遗爱颂》称“辩其谱系，范阳之大族也”^④。

虽然自己多以范阳称其世系，但某些史料笔记所载材料却断定张说有越族冒姓、攀附高门大姓之嫌。如《封氏闻见记》云：

著作郎孔至，二十传儒学，撰《百家类例》，品第海内族姓，以燕公张说为近代新门，不入百家之数。駙马张垪，燕公之子也，盛承宠眷，见至所撰，谓弟叔曰：“多事汉，天下族姓何关尔事，而妄为升降！”叔素与至善，以兄言告之。时工部侍郎韦述，谄练士族，举朝共推，每商榷姻亲，咸就咨访。至书初成，以呈韦公，韦公以为可行也。及闻垪言，至惧，将追改之，以情告韦。韦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奋笔将为千载楷则，奈何以一言而自动摇。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复改。^⑤

开元与张说同时的谱学名家孔至、韦述既然“谄练士族”，将燕公列入“近代新门，不入百家之数”，当有所据。中唐人王颜在《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尖锐论及此云：“开元中，左丞相张公说越认范阳封燕国公；大历初，左相缙叔越认琅琊封齐国公。……如燕齐两公，皆名世大

① 卢藏用《太子少傅苏瓌神道碑》，《全唐文》，卷238，第2412页。

② 苏颋《赠礼部尚书褚公神道碑》，《全唐文》，卷258，第2612页。

③ 张九龄《故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张九龄集校注》，卷18，第951页。校勘记注：“字说”二字据《墓志》补。新旧两《传》及《英华》、《全唐文》均作“字道济”。

④ 孙逖《唐故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燕国文贞张公遗爱颂》，《全唐文》，卷312，第3173页。

⑤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10，中华书局，2005年，第94—95页。